

昆仑诗丛（七）

梦园情

艾砂 马乙亚 合著



启扉小语

在《梦园情》删删成书的时候，说上几句话，权作表明心迹吧。

“文学表现自我”，“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生活自白的一部份”。这些都是熟话。尽管诗歌在“表现自我”上有其局限性，但仍可以找出我们生活的脚印。

是的，脚印中有欢声笑语，但更多的是泪，是血，是呐喊的余音。

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部份，我们都认为是“偏得”，因为，人的一生总是风平浪静，总是平平淡淡，那又有什么意味呢？喜怒哀乐赋予每个人时，决不会半斤八两、平分秋色。

我们最满足的是“人间晚晴”，我们两个人历经磨难，居然共存。雨过天晴，相偕度晚，儿女成人，生活杜虑。借用一句古语：“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然而，回首往事的时候，难免慨叹顿生。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人，深知阳光、暖流和生命之可

贵。对于我们来说，爱情不是甜哥蜜姐，而是融进生活——听凭时而和风细雨，时而霹雳闪电，时而听几声颂扬，时而横眉立目以申斥的生活。我们感谢时代赋予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如此耐人寻味。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公务员的女儿，在寻找生活的路上相遇了。年轻时就有个共同的心愿：要当举火把的人，为后来者照路，纵然烫伤皮肉或焚身碎骨也不思反悔。在这条路上，跌倒爬起，反反复复，不懈不怠。好在我们两人从未分离，相扶相掖，彼此互勉，跌倒拽一把，拂去身上泥巴，照常走路而已，有点伤疤血痕，也全无记在心上。

是的，数十载奔波，几十年风雨，未能使我们心疲惫软。岁逾花甲，很不愿颐养天年，夕阳虽好，亦不甘坐下欣赏。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的几句话使我们颇受启迪：“我既不伤春，也不悲秋；既无老之可叹，亦无病之可虑。生当盛世，唯一的希望是多活许多年，多做许多事情。”如果寻觅精神支柱，可归原于我们手中的火把，在一息尚存之时很不愿意让它熄灭。

在钱位高抬、万人朝觐时，我们宁愿做些傻事，抖漏生活的“家底子”拎几片丢失的残梦。如

果其中有几粒闪光点，当作敛尾的萤火虫寄于大千世界，让那些后来而又动辄厌世的同道者获得一点点精神寄托，未尝不能使我们的晚年生活找到新的平衡点。

这个集子是我们合作的“头胎”。我们的心态是：不论丑俊，让人们去评说。评说是历史的铭记，我们也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臧克家先生以其耄耋之年，米寿之岁，爽然提笔为我们题写书名及题辞；诗人徐放，不顾多病之躯，讲学编写之劳，灯下伏案为我们的诗集作序。实令我们感动。沙驼、海笛二兄，抽出编纂《昆仑诗选》及《诗刊》之劳隙，为出本诗集东奔西走。特别是沙驼兄慨然负起印校、设计之责，抄稿、编目之苦。在此一并向亲友们致谢。

艾砂 马乙亚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艾 砂 (刘沙)

艾砂，现名刘沙，原名刘树春字向舒。曾用名刘萧沉、舒戈。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乡后沙涧人。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生。受过中等教育。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四十年代初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掏心草》载于《利民》画刊。继而在《蒙疆文学》杂志、《蒙疆新报》副刊以司空鹿、萧沉、沙群、舒琼等十几个笔名发表作品。短篇小说《虹》、《马族的悲哀》、中篇小说《动荡》、《蠢流》极具抗日意识，惊动日伪当局，从而逃离塞北。初在晋南中条山参加抗日游击队，继而寻觅学府，浪迹西北。一篇怀友散文在西安某报刊出后，受到副刊主编、鲁迅战友郑伯奇先生之赏识。接连又在几家报纸文艺副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多篇。一九四五年冬进入西安《正报》工作，发表了中篇小说《泥土之歌》、《大洋河上的人们》。翌年一度主编副刊《幽风》，发表大量左翼作家激进作品，并参与进步文化活动，触怒国民党当局。经友人规劝，悄然离陕。

一九四六年冬，在沈阳与曹清主持诗战线社，

并主编《诗战线》、《诗哨》、《诗阵地》等诗刊，翌年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先后担任三家报刊编辑，并一度深入兵工厂从事工运工作。解放后历任《东北军工报》、《红旗报》、《林业工人报》编辑主任、主编、副社长等职。胡风案发，受株降职，尔后几个狂涛激浪，将其推落小兴安岭，从事情不由己的工作。十年浩劫，在数难逃。平反后作了一段准七品级领导工作，主编一部地方志书后离休还乡。其文学业绩在《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新诗大辞典》《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诗歌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中国诗人大辞典》《中国民间名人录》等书有记述。

克 尼（马乙亚）

马乙亚，辽宁省锦西市高桥镇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廿六日生。大学文化。解放前一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嗜爱文学，擅长音乐。中学时代开始写作投稿。一九四七年曾主编《时报》妇女版，同时以克尼、塞征、艾黎、郁哈、萧歌等笔名，为沈阳几家报纸副刊及《诗战线》、《诗哨》等诗刊撰稿。著有散文《女兵日记》、诗歌《草原上的足迹》、

《辽河谣》等三十多篇。解放后任过《东北军工报》、《红旗报》编辑、记者，《森林工人演唱》、《林业演唱》主编等职，同时写过以林区为题材的歌曲数十首。十年浩劫，重病羁身，时好时愈。一九八五年定居京郊。其业迹在《中国民间名人录》等辞书上有记述。

注：凡编入本诗集内马乙亚的诗作，均于诗题后标有符号“*”。

人生难得一知己

——《梦园情》序

徐 放

岁月蹉跎，时序如流，屈指算来，我与老友，诗人艾砂、马乙亚分手又一年多了。我们同居一个城市，相距又不甚远，电话可通，驱车可达，本来是可以经常通消问息的；然而，由于彼此同惯于爬格生涯，总想在“夕阳无限好”之时，把自己的生活底子抖落一番，多吟几行诗，多写几本书，以补偿过去被荒废多年的时光。加之社会活动较多，会议、讲学不断，迎亲送友频繁，生活琐事羁身，爬格效率不高，所以许多想办的事未能办成，想会之友未能如约。这种情景，上了年纪又不肯虚度光阴的老人，彼此是愿意互为理解和不相责怪的。

一部《梦园情》诗稿平整地放在案头。这是一部充满浪漫而又温情脉脉的伉俪诗集，又是一部战友情的颂歌，也是一组同志情谊的续编。看这名儿，就会使你思潮万顷，浮想联翩。面对如此厚厚一摞

原稿，联想到作者艾砂（刘沙）马乙亚（克尼）夫妇坎坷多难、同享晚晴、感情弥笃的一生；用血和泪写成的诗章，不能不使人动情。

据记忆，我和艾砂通信相识，应该追溯到一九四五年末。后几个月我奉命撤回了延安，音讯中断。一九四六年末，他和曹清（田秧、新焰）到沈阳与几个友人组织诗战线社，主编诗刊《诗战线》、《诗哨》以及后来的《诗阵地》等，大刀阔斧地拓展东北蒋管区的民主诗歌阵地。祖国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呻吟十四年，文苑几近荒芜，知识界多数人的思想还不能一下子从“正统观念”中挣脱出来，对当时的时局的认识还停留在“只求祖国独立，不问哪党哪派掌权”的阶段。所以《诗战线》传来的诗风——一股从云、贵、沪、渝和延安窑洞吹来的新风，是带有很大政治风险的。倘无极大的政治胆识，是不敢发表臧克家、李广田、艾青、田间、安娥、邹荻帆、李白凤、师陀、李一痕、吕荧、吕剑、徐放、谷风（牛汉）、沙鸥、海滔、青勃、苏金伞、栾星、索开、荒弩、吴朗、申奥、马牧边、沙陵、吕亮耕、戈扬、包白痕、罗铁鹰、鲁荻、李尤白、阎栋材、麦紫、罗迦等左翼诗人作品的。这股新诗风，既经吹来，不能不惊动国民党当局的文化鹰犬，因而逼迫诗刊主编艾砂、曹

清不得不采取“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策略，一方面将火药味较浓的作品频繁更动笔名，或者在上述诗人诗作中夹杂一两篇诗论发表，或者将名家作品夹杂在无名或名字不显赫的作者中间刊登；另一方面，发现敌情紧急、险象环生时，立即停刊或者“更名改姓”，易地出版。这种在白区出版进步诗刊的曲折做法，当时内部同志管它叫“蘑菇战术”。不过他们的工作魄力和革命胆识毕竟大了一些，不仅连续发表了许多左翼诗人的作品、而且公然发表了建立在沪滨由进步诗人臧克家、安娥、李广田、任钧等人挑头组织的“中华全国诗歌朗诵者协会”的章程，改以《中华全国诗歌朗诵者协会沈阳分会成立宣言》的形式发表。《宣言》直斥反动当局，措词激昂，切中要害。其中竟有这样的话：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人民痛苦的生活，我们诗歌工作者不能保持沉默，不能装哑叭。我们要唱出人民的不幸，人民的苦痛。……诗人是人民的代言人，决不能为铜臭、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诗人要有绝对的创作自由……今后我们的工作是把人民的痛苦编成歌，唱给人民听……。

《宣言》最后号召诗歌工作者、诗歌爱好者拿

起笔来站到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要生存、要民主、要自由的行列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宣言》刊出后，在全国诗歌界引起极大的反响。陕西文艺界李尤白、沙陵、鲁荻、田农、天祺、曹皖砂等青年诗人接到《宣言》后群起响应，组织集会，成立《中华全国诗歌朗诵者协会西安分会》并在《国民日报》副刊《笔阵》上发表宣言，出版专刊。这个浪潮又由戈扬等人卷到甘肃、新疆等省区。原由上海诗歌界发起成立的全国诗歌朗诵者协会，至此演成狂飙之曲，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正因为如此，由艾砂、曹清主编的《诗战线》引起了沈阳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关注，追查政治背景，追究主编责任。在严重事态面前，诗刊主编艾砂、曹清将诗刊更名《诗哨》，移到沈阳《前进报》出版。《诗战线》至此出刊十三期，悄然停刊。鉴于《诗战线》诗稿火力太猛、不利隐蔽的经验教训，《诗哨》所登的诗稿转为平和，诗论、译诗和新作者占的比重较大。尽管如此，也未能逃脱国民党当局的眼睛。故《诗哨》出刊到十一期也被迫下马。此刻，曹清经中共沈阳地下组织安排到北满（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艾砂则就地隐蔽。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又在沈阳一家小报副刊（《新新日报》）上将《诗哨》更名为《诗阵地》复刊。因为有的

文稿公开支持学潮，声援北京发生的“七·五惨案”，受到当局追查。因而只出三期便又夭折了。

这段史实是诗人诗歌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两位诗人结成伉俪的导火索。既饱含战斗的激情，又是诗歌的“原韵”更富有两性间的同志情、友情和彼此心底的诚挚的爱情。当时两位诗人发表在《诗战线》、《诗阵地》和当地几家报刊上的一些诗作，大都隐讳的、曲折的反映了对于明天自由生活的渴望。如、

唱起明天的歌，
心里有一把不灭的火。
期望着，童年的梦，
进入明天的生活。

唱起明天的歌，
心里有无尽的快乐。
在一个友爱的花园里，
到处是笑脸、到处是花朵，

明天的歌最甜最甜，
明天的歌最美最活泼。
唱得兰天白云飞，
唱得丰年万家乐。

——克尼《明天的歌》（原载《诗战线》）

在组诗《难忘的诗情》里，也反映了诗人在白区工作期间，把友情、亲情、同志情综合在一起的动人之笔，且看：

不要说北风刮得落叶缤纷，
她会很快为你送来一个早春。
任那夜莺唧唧喳喳叫去吧，
阳光灿烂的明天即将来临……

——艾砂《北风疾》

夜静心难静，
相见格外欢。
休怪残月升又落，
长堤夜露湿衣衫，
天凉不觉寒。
水急人行缓，
细语洒河湾。
思情恋意剪不断，
三日不见如隔年。
再会定哪天？

——艾砂：《浑河岸边》

一对年轻诗人对于美好明天的明白无误地憧憬，对于自由友爱的追求，正是他们向往革命、献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一个青年人若没有对明天的美好愿望，没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支柱，很难设想他会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可以这样说：诗人所追求的正是大革命前夕中国进步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旧中国崩溃前夕吸引千百万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事业，心甘情愿地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斗争，正是由于在这些人心底始终有一支向往着美好明天的圣火在熊熊燃烧，为实现美好明天而鞠躬尽瘁，不惜以身殉此真理。

作者艾砂是北京西山脚下一个农家孩子，自幼聪颖好学，因家境贫寒，带着童年时的梦幻，步入阴冷多变的大千世界。想在沙滩上做个淘金者，却误入了他未曾想到的文学创作苑林。开始在塞外一个小城立定脚跟，在刘绍曾、曹清、王秀雄等具有进步思想友人的帮助下，创作迅速进入旺盛期。撰写二十多篇散文、十几篇中短篇小说，在《蒙疆文学杂志》、《利民》半月刊及《蒙疆新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他的短篇小说《虹》写的是印度人民抗英的故事；他的中篇小说《动荡》和《蠢流》及以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大洋河上的人们》、《泥土之

歌》均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抗争意识。因此，他成了日伪特务机关侦察、追捕的对象。

他逃离了塞外，决心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曾在桑干河畔徜徉，又到晋南盐池边觅友，终于在中条山找到中共掌握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一段新的生活。后来，由于队伍内讧，他离开黄河之滨的抗日基地，到达大雁塔下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以想见，在举目无亲、两眼墨黑的异乡土地上，一个流亡青年想找到一个生活立足之点，要比攀登华山的千尺磴还难。魂牵梦绕的“上大学”幻觉，终于在一个早上破灭了。而他躺在西安小南门外何家村一家房檐下撰写的几篇散文、短诗，在西安《秦风工商报》副刊（郑伯奇编）和《西京日报》副刊（郑震主编）、《西京平报》副刊（芦笛、阎栋材编）发表后，却引起了陕西文艺界对这个从战区来的青年作者的重视。他的中篇小说《大洋河上的人们》在《正报》副刊连载后，奠定了他在西北文艺界立足的初步基础。

每一个文学创作者的创作高潮总是有阶段性的，而这种阶段性总是受主客观环境的制约的，也可以说，客观环境、人际关系的顺逆，对于作者创作激情的升降是相抵相消的。作者在西安时期正值抗

日战争胜利结束，解放战争之火明明灭灭的时候，也是他离开敌占区、游击区不安的环境后生活初获安定，而内战又将全面爆发的时候，作者象当时每个进步青年一样，把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当作自己一项神圣职责，从而把写作锋芒从抗日救国转向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主流上来。以大量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投入新民主主义的斗争洪流中去，在陕西、河南、云南、安徽、京沪等地报刊接连有他的作品发表。同时，参与由郑振铎嘱托、由郑伯奇、李敷仁、青苗、鲁荻等人筹组的中国文协西北分会活动。也许他那过激的诗文，“非法”的足迹，招致了反动当局的注视。他又一次上了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形势所迫，在进步友人规劝下，他悄然走出陕西。

在动乱的一九四六年七月，诗人回到他的故乡北京，欲找立足之地，重操旧业。但经两月奔波终无所获，不得不怅然离开，步入“闯关东”之路。在沈阳觅得糊口之处后，未及歇息，便投入开辟诗歌阵地之战。不久，他参加了中共地工组织，从事工运、兵运工作。在诗歌战线出击半年多，以“锋芒太露”再次进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幸隐蔽及时，未遭毒手。

五星红旗在神州上空飘扬的时候，诗人放

声高歌：

南郊炮息宣告旧秩序的终止，
工厂汽笛拉起古城的新生。
蜷伏的中街揉开脸上的折皱，
灰色的皇宫舞起它金色长龙。

万家店铺红旗熠熠迎亲人，
十里长街队队降兵去愁容。
共和国第一次拥得工业重镇，
这里将构筑起人民的钢铁长城。

梦醒，该扎扎实实舒筋展骨啊！。
天亮，披起灿烂朝霞再登新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诗人被党信用踏入《兵工工人》、《东北军工报》、《红旗报》及东北《林业工人报》等报刊的领导岗位。胡风案发，再遭劫难。从此，“负疾”北国，远戍兴安。偶而写些奉命文章，署名只是昙花一现，在那以写检讨当“创作”的岁月，诗人之锐，尽遭磨弃，笔端多年生锈，只能老泪偷弹。及至落实政策，已年逾花甲，日薄西山。单位反聘主修志书，又在岗五、六